

晚学集

◎ 李瑚 著

W A N X U E J I W A N X U E J I



晚 学 集

◎ 李瑚 著



507499

广西工学院鹿山学院图书馆



d507499

中国文史出版社

晚 学 集

李 瑥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学集 / 李 瑥 著.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8

(当代语言学论丛)

ISBN 7-5034-1822-2

I . 晚… II . 李… III . 综合-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H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8527 号

晚学集

责任编辑：刘芸 封面设计：李彦亮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址：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100811

印 刷：北京凯通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323 千字

印 张：14.6

印 数：1000 册

版 次：2008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5034-1822-2

定 价：25.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自序

新世纪开始，我将退休后所作文稿及历年所作诗词，整理成《魏源研究》、《晚学集》和《凌河诗词稿》三书。现在《魏源研究》和《凌河诗词稿》已经再版，《晚学集》即将付印，照例也应写篇序言。

我在退休前，主要做的是集体研究工作，最初中国近代史分为：政治（辛亥革命）、经济（中国资产阶级）、外交（帝国主义侵华史），后来三组合一，共同撰写《中国近代史》（百万字三卷本，“文革”开始后停写）。此后完成：《中国史稿》、《中国通史》、《中国古代史常识》（明清部分）、《中华文化辞典》，以及其他临时性任务，加上政治运动、下放农村、劳动锻炼等，这就很难再有时间做个人感兴趣的工作。所以，现存文稿多是在近年完成的。

回首往事，深感人生的匆促。从1951年参加本所工作至今，转瞬间已经55个春秋。杜甫诗：“人生七十古来稀。”陶渊明诗：“一生能复几，倏如流电惊。”何况年已八十，优游林下，能不珍惜余生？

《说苑》云，昔师旷劝晋平公晚年读书云：“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炳烛之

明，孰与昧行乎！”《颜氏家训》亦云：“盛年已失，犹当晚学，不可自弃。”故愿借此秉烛之明，裒集芜散杂稿，名之为《晚学集》。但不知其中有一得之见否？

《晚学集》所收文稿包括：感旧、论述、校注、序跋和京华琐谈等，共 38 篇，30 多万字。这次结集，对已发表文稿的个别文句略作了订正或增补。由于晚年多病，精力有限，特别是在忽患脑梗塞症以后，记忆力减退，工作顾此失彼，而颈椎病的发作，眩晕、呕吐，使写作或校勘，更增加了困难。现在本书出版，感谢出版社同志，也感谢读者，希望读者于浏览馀暇不吝赐教是幸。

2006年5月17日于莲花池畔

简 历

李瑚，字伯琦，1926年5月生。历史学家、诗人、书法家。北京辅仁大学历史及经济两系毕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国家发给社会科学突出贡献特殊津贴，兼任中国南社与柳亚子研究会理事，湖南省《魏源全集》编委会副主任、学术顾问，中华诗词学会会员，首届中华诗词研讨会代表。退休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秋韵诗词选》编委，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南社与柳亚子研究分会顾问，中华诗词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华夏国粹文化研究院院士，北京华夏龙吟诗书画研究院名誉院士，中国中外名人文化研究会文化艺术委员会学术委员、特聘特级书画师，中国国际书画艺术研究院终身书法家，北京辅仁大学校友会理事、辅仁美术研究会研究员、理事、顾问等。

著有《中国经济史丛稿》、《魏源研究》、《晚学集》、《凌河诗词稿》及有关宋史、近代史、经济史、货币史、文化史、北京史、考证学等方面论文。与人合著《中国通史》、《中国史稿》、《中国古代史常识》、《中华文化辞典》、《中国近代史历表》、《秋韵诗词选》等。其中《中国通史》获国家图书奖，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奖，《中华文化辞典》获广东省优秀图书奖。

诗词入选：《金榜集》、《二十世纪中华词苑大观》、《中华诗

词年鉴》、《千古绝唱——中华当代诗词名家名句选集》、《华夏百年词苑英华》、《中华诗词家风采录》、《新千家诗词赏析辞典》、《中华经典诗篇》、《历代经典诗词选评》、《情系海峡·两岸和平诗词联大典》、《吟坛名家录》、《诗鉴》、《词鉴》、《百年诗人图典》等七十馀种。诗词多首获一等奖、特等奖、金奖、诗学精英奖等。

诗词文化艺术团体、诗词著作编委会等赠与“二十世纪华人优秀诗词艺术家”、“中国诗词著作家”、“中国杰出诗人”、“当代杰出词作家”、“诗词名家”、“爱国诗人”、“中华诗星”、“诗学精英”、“中华当代杰出功勋艺术家”、“中华名流·当代百佳艺术名家”等称号，又经中华诗词艺术家资质鉴定委员会审核认证，获“诗词艺术大师”称号。

书法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书画集》、《中国诗词书法选集》、《辅仁校友书画集》、《20世纪国际文化大系》（综合卷·书法部分）、《中国当代书画艺术家作品精选》、《中国老年书画摄影艺术全集》、《20世纪世界书法作品鉴赏》、《21世纪中国老人诗书画集锦》、台湾辅仁大学建校70周年《两岸校友艺术品义卖联展目录（画册）》等十数种。

学者评其经济史著作云：“若干年来，治宋史者往往于明清史不甚了了，而治明清史者又上不及宋，如阁下之既于宋史颇见功力，而又于明清史以及近代皆有创见者，实极难得。尤可贵处，乃无一篇作泛泛之论，甚为佩服，严谨之学风，正是今日所当倡导，大作必将在史学界产生好影响。”又云：“李瑚先生系已故史学大师陈垣先生弟子，多年从事文史研究，除经济史外，尤其擅长史学考证，或称其著作周密精详，严谨深邃。行文雅畅，

言必有据。旁征博引，博收精掇。确是不易之论。”评其《魏源研究》云：“资料宏富，论理严密，见解精当，行文流畅，是目前国内近代人物研究中具有一定权威性的系列化专著。”评其诗词云“雍容大雅，意正品高，几十年作品脉络一贯，性情格调兼而有之。虽潜心剑南，但成诗却取法乎唐，尤其古体诗更耐人寻味。诗馀（词）在性灵方面尤优于诗。”又云：“其作品文字功底深厚，风格独特，意韵悠远。或奔放豪迈，气势磅礴；或古朴敦厚，绵长隽永；或温文婉约，情浓意真。……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评其书法云：“乍观清秀儒雅之气扑人眉宇，细察使转多变，用笔极尽精微。通篇气韵贯通，意境幽远，在秉承‘二王’书风基础上集众家之妙，揉进个人情趣，观之给人以清风徐来明月高悬之美感”。

传略见《中国社会科学家大辞典》、《世界优秀专家人才名典》、《世界华人文学艺术界名人录》、《中华传世诗词艺术家大辞典》、《世界杰出华人诗词艺术家年鉴》、《中国诗人大辞典》、《中国词人辞典》等。

目 录

序 / 1

晚学集 1

- 中国历史考证学与陈垣先生对它的贡献 / 1
我的老师陈垣先生 / 33
读《通鉴胡注表微》 / 65
怀念开创《中西交通史》学研究的张星烺先生 / 91
难忘的范老治学名言 / 95
深切悼念启功教授 —— 忆元白先生二三事 / 99

晚学集 2

- 谈近代史料的征集和整理 / 106
“莫须有”新解 / 112
清代的商人著作家 / 116
关于王鼎之死 / 124
我与魏源研究 / 127
“大器晚成”的《魏源全集》 / 156
《皇朝经世文编》不应收入《魏源全集》吗? / 162



- 173 / 《清史稿·食货志·户口篇》校注
- 199 / 《清史稿·食货志·赋役篇》校注
- 253 / 《清史稿·食货志·仓库篇》校注
- 282 / 《清史稿·食货志·钱法篇》校注
- 316 / 《清史稿·食货志·会计篇》校注



- 344 / 《中国古代史常识》(明清部分)前言
- 351 / 《陶澍集》前言
- 354 / 《曹操传》序
- 358 / 《陶澍评传》序
- 363 / 《魏源传》序
- 365 / 《魏源研究成果集成》序
- 368 / 《诗古微》(校点本)评介
- 378 / 岳震川与《赐葛堂文集》
- 383 / 钦善与《吉堂文稿》
- 387 / 《北上日记》跋
- 397 / 《尚书地理今释》校记



- 408 / 谈北京的河水与园林
- 416 / 清代著名学者在北京的故居
- 420 / 魏源在北京

-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北京的货币和物价 / 425
什刹海与“荷花市场” / 434
“鼓楼前”往事 / 442
附：“鼓楼前”商店回忆图 / 449
烟袋斜街忆旧 / 451
谈北京的四合院 / 454

中国历史考证学与陈垣先生对它的贡献

陈垣先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历史学家，著述宏富，学域宽广，无论在历史学研究方面，还是在目录学、校勘学、年代学、史源学、避讳学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值此纪念先生诞生 110 周年之际，欲草小文，以为芹意之献。但馥郁群芳，难择芝蕙，现在仅就先生对于中国历史考证学的贡献，作一肤浅的探讨。

一

想要探讨陈垣先生对中国历史考证学的贡献，首先要对中国历史考证学的历史作一简略的回顾。

考证，又称考据。考证之名。最早见于何书，难以即答。《辞海》“考证”条，引姚鼐《复秦小岘书》：“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异趋而同为不可废。”《辞源》“考证”条，引《元诗百一抄》刘固《夏日饮山亭》诗：“人来每问农桑事，考证床头种树篇。”实

(一)

际上，“考证”一词不始于此。

学者对于“考证”一词含意的理解也不一致。如方东树《汉学商兑》云：“夫说经不衷诸义理，辨伪得真，徒以门户之私，与宋儒为难，非徒不为公论，抑岂能求真得是。……然此犹不过欲以汉学考证，破宋儒空言义理，谓病其空疏耳。其后臧氏、段氏、江氏等，……是岂不可以已乎？”又引《四库提要》云：“汉代传经，专门授受，各有师承，非同臆说，专而不杂，故得精通。自郑元（玄）淹贯六艺，参互考稽，旁及纬书。亦多采摭，言考证之学者自是始。”^①按《后汉书·郑玄传》云：“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芜，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②这里所说的考证，实际上是指儒生对于经书的校勘与诠释。

清代考据学大盛时期，一般学者讲考证，均以经学为主。有的学者认为，其他考证是“补苴掇拾”的杂学，不能与正统的经学诠释相比拟。焦循与孙星衍《论考据著作书》云：“汉时各传其经，即各名其学，……无所谓考据也。贾、郑大儒继作，以百家诸子之书，术数谶纬之学，一切通之于经。……晋宋以来，骈四俪六，间有不本于经者。……赵宋以下，经学一出臆断，古学几亡，于是为词章者，亦徒以空行为事，并经之皮毛亦渐至于尽。……王伯厚之徒习而恶之，稍稍寻究古说，摭拾旧闻，此风既起，转相仿效，而天下乃有补苴掇拾之学。……强以考据名之，以为不如著作之抒写性灵。呜呼！可谓不揣其本而齐其末矣。近世以来，……其自名一学，著书授受者，不下数十家，均异乎补苴掇拾者之所为，是直当以经学名之，乌得以不典之称之所谓考据者，混目于其间乎？”^③（王伯厚，即王应麟，见后。）

焦循以为，考据就是“寻求古说，摭拾旧闻”，即“补苴掇拾”之学，著名学者如戴震、钱大昕等，不能说是考据家，而应称之为经学家。这反映了封建社会中统治者尊经重道的思想。在尊经思想影响

下,经学考证有了较多的发展。但这种考证不能违背经义,一切考证都应统一于经。因而,经学考证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其次者只能流于支离破碎的文字短钉。

历史学中的考证,与经学中的考证不同,它既不单纯是为注史而作,又不受史书的约束。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云:“治经断不敢驳经,而史则虽子长、孟坚,苟有所失,无妨箴而砭之。”这就是史学考证与经学考证不同之处。因之,史学考证有了较为独立与迅速的发展。

清代学者中比较重视考证者为章学诚。《文史通义》载其《唐书纠谬书后》一文云:“校讎攻辨之书,如病之有药石,如官之有纠弹,皆为人所患苦者也。然欲起痼疾而儆官邪,则良医直史,不惮人之患病而必有以期于当也。疾愈而医者酬,奸摘而弹者赏。惟校讎攻辨之书,洞析幽渺,摧陷廓清,非有绝人之姿,百倍攻苦之力,不能以庶几也。其有功古人而光于后学,不特拯一人之疾,劾一官之邪而已也。”^④他在这里所说的“校讎攻辨之书”。实际上指的是考证之学。他认为:“非有绝人之姿,百倍攻苦之力”是不可能做好的。他又说:“学问成家,则发挥而为文辞,证实而为考据。比如人身,学问其神智也,文辞其肌肤也,考据其骸骨也,三者备而后谓之著述。”在他的心目中,考据成为著述中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近代学者明确提出考证方法的是梁启超。他说:“考证者,所以审定史料之是否正确,实为史家求征信之要具。”^⑤胡适则认为:“考订学,是考定古书的真伪,古书的著者及一切关于著作的问题的学问。”^⑥他们把考证仅仅视为对史料的审定,或对古书及作者的考定,是不够全面的。

现代辞书中对于“考证”的解释是,《辞海》“考据”条云:“考据,

也叫考证。研究历史、语言等的一种方法。根据事实的考核和例证的归纳，提供一定的材料，作出结论。考证的方法，主要是训诂、校勘和资料搜集整理。”《辞源》解释云：“考据，也称考证。指对古籍的文字音义及古代的名物典章制度等进行考核辨证。……考据之法，大致以校勘厘正文本，以训诂贯通字义，以积累资料供研究者的应用。”

参考这些定义，可以认为，考证是通过用提出事实，即证据（有时还有推理）的方法进行对史书、史事或史料的考核辨证、沿流溯源的工作，以确定考证对象的有无、真伪、是非，或其历史的发展。它不单纯是校勘，也不单纯是训诂。它不仅是一种研究方法，也是一个研究过程。它不仅是资料的搜集整理，也是通过资料搜集整理，以充分的证据，求得研究的成果。由于考证成果的不断提出，推动了史学研究的发展。考证是史学研究中的重要一环。考证可以为史学研究服务，也可以独立发展。那种把考证著作排斥在历史著作之外的说法，或是出于某种偏见，或是对于考证的无知。

现在我们回顾一下中国历史考证学的发展简况。

我国历史悠久，一向有重视历史学的传统，政府很早就设置了史官，以进行记事和修史工作。《周礼·天官·宰夫》：“[八职]六曰史，掌官书以赞治。”郑玄注：“赞治，若今起文书草也。”^⑦《汉书·艺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⑧史官从最初起草文书，典理图书档案，进而记言记事，又进而奉命撰写本朝历史。史职不断专业化，其职位亦不断提高。从秘书、侍从、史官，至汉初，太史公已“位在丞相之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⑨“天下遗闻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⑩由于史官的职权，他们掌握了大量的原始资料，为修史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司马迁以太史公编纂《史记》，他认为：“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⑪班固以兰台令史、典校秘书编纂《汉书》，他认为：“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纂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⑫由于这时的史料易得，即使“书缺有间”，也仍可用其他史料补足。因而，他们对待史料的态度是，择其“雅训”者而用之。史料充足则“缀辑”成篇，不足则“缺而不录”。孔子云：“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⑬孟子云：“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⑭马、班对待史料的态度，实际上就是孔、孟对于文献的态度。

魏晋南北朝以后，史官名称或有不同，但各有史职专司修史。朝代可以更换，修史工作不能停止，时政记、起居注、日历、实录、国史等均各齐备。政府各部事务，亦有档案记录，修史者可以随意调阅，“因彼旧事，定为新史，”故编纂成书比较容易。如梁沈约撰《宋书》100卷，一年完成。《晋书》130卷，唐房玄龄等撰，两年多完成。其他如元脱脱等修宋、辽、金三史，《金史》一年完成，《辽史》一年多完成，《宋史》496卷，是二十四史中最大的一部，仅用两年多的时间就写完了，成书的时间都很短。

李延寿修《南、北史》180卷，号称“佳史”，提出的修史困难三条：“一则王道得丧，朝市变迁，日失其真，晦明安取？二则至人高迹，达士宏观，因此无闻，可为伤叹。三则败俗巨蠹，滔天桀恶，书法不记，孰为劝奖？”^⑮这三条困难，实际上是对史料如何选取和对某些史